

【黄河三角洲研究】

程式化书写下的县情特色与历史细节：
万历《齐东县志》评析

李沈阳

(山东航空学院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 山东 滨州 256603)

摘 要:齐东县志的修纂始于明正德年间,到明万历四十五年时已经百余年未修志。刘希夔任齐东知县后,在县人的请求下修纂并刊刻万历《齐东县志》。是志采用分纲列目结构,以考、表、志、传、录五体为纲统摄二十九个篇目,续补从明正德十二年至万历四十五年间内容,较为全面忠实地记录当时的齐东县情。另,是志凸显了齐东县城四面环河的特征,为其此后迁城乃至湮没于黄河埋下伏笔;其关于万历乙卯大旱等事项的记载不仅反映万历年间的社会状况,还可补正史之略,自有其价值。

关键词:万历《齐东县志》;体例;县情;旱灾;明史

中图分类号: K 2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1.015

齐东是山东的旧县名,位于今黄河三角洲,始置于元朝^①,撤销于 1958 年,其地分属今山东邹平和博兴。万历《齐东县志》由时任知县刘希夔修纂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被评价称“体例皆备,颇合志例……文辞能弃明人靡弱之气”^{[1]293}，“体例整齐,厘次有序”^{[2]15-83}。是志原有二十九卷,今存卷一至十七,主要记录了明万历年间齐东县的民生利弊和社会状况,对研究齐东县历史、黄河三角洲区域史和明史都有一定的价值。目前除地方志工具书或著录性作品外,尚未见到专题论文。现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是志刻本

胶片(索书号:CBM0776),对其修纂、体例和内容等问题做些探讨。

一、修纂与传播

齐东县设立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明确的修志记载,直到明正德十一年(1516)时任知县萧敬谏(今江西吉安人、贡士)才开始修纂、刊刻第一部县志,其名称在《千顷堂书目》中著录为“萧敬谏齐东邑乘”^{[3]169}。从那时起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百余年时间,历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齐东却没有相应的县志记载其变动,使后世

① 万历《齐东县志》作为齐东县志最早的传世刻本,对齐东县始置年份的记载颇为模糊,称元“太宗六年尽得中原诸郡,七年得顺天等三十六郡,齐东立县当在此时”;光绪《齐东县志》的记载是“自齐东镇之名立,元于太宗七年升镇为县,此齐东县所由肇也”;民国《齐东县志》的记载则是元“宪宗二年,以邹平县齐东镇立齐东县”(分别见[明]刘希夔修纂:万历《齐东县志》卷二《沿革考》,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胶片(索书号:CBM0776);[清]余为霖修纂:康熙《齐东县志》卷一《职方纪·沿革》,《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30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4 年影印版,第 171 页;梁中权修,于清泮纂:民国《齐东县志》卷二《地理志·建置》,《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 361 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6 年影印版,第 99 页)。元太宗七年为 1235 年,元宪宗二年为 1252 年,两者相差 17 年,未知孰是。

收稿日期:2025-05-27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CWTJ31)

作者简介:李沈阳(1976—),男,山东平度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秦汉史和历史文献整理研究。

E-mail:215313923@qq.com

面临文献缺失的境地。县志年久失修引起地方士绅的关注,因此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刘希夔(浙江平湖人、选贡)到任后,他们提出修志请求,似乎被后者婉拒。他在《〈齐东县志〉序》中说:“余曰:嘻!余于闽濬濠,历七十日而告成,心力几殫。今甫下车,而飞蝗四集已饥,弗暇暇笔削乎。”后来他还是听从“夫足信也而可后于足食乎”的建议,“乃按旧帙,访遗闻,搜废麓,请发士大夫家藏,掇拾残碑薜碣,于以芟繁冗,饰鄙陋,润已陈之”,大约用了五个月时间完成,“始于孟秋之朔,成于嘉平之末”^[4],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

是志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有正德十一年(1516)萧敬谏修纂的志书(简称正德志)做基础,正德志“其目四十有五,分为六类,详而不冗,简而不略”^{[5]155},刘希夔修纂时只需要补入从正德十二年(1517)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间的内容即可;二是有县中官员和士人的协助,是志卷首“修志氏名”中除了“撰次”刘希夔外,还有“采辑”5人(县儒学教谕王弘道、乡绅张梦鲸、举人张梦蛟和郭广、贡士王征)、“督刊”1人(县丞张伯贞)、“校正”7人(张惟登、赵完、李荣春、刘昌胤、王景科、李登阶和郭磐)^[4]。他们作为修纂是志的参与者,也可谓最早的一批读者。与刘希夔的序相比,张梦鲸(县人、进士)在跋语中说刘希夔“开馆集荐绅父老,俾各出记闻,躬自裁定”^{[5]157}更符合实际修纂过程。

是志刊刻后,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县余为霖(今江西金溪人、举人)重修县志时仍行于世,他在修纂时与刘希夔的做法相似,补入“自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至我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5]158}详情;然而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县长梁中权(辽宁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毕业)再次修志时,称“萧志、刘志不可见,所见者惟余志”^{[6]23},其中的“刘志”就指是志。

据上所述,是志从修纂(1617)到被声称“失传”(1935),大约传播了300多年。当然,民国时修志未见到是志不意味着它完全失传,事实上其刻本还在通过其他途径传播,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够再次翻检是志的原因。

二、结构、体裁与章法

地方志体例的含义,见仁见智,如清章学诚

所说:“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7]292}。有研究者以结构、体裁和章法三个要素作为评价地方志体例的视角^[8],较容易把握。下面就从这三个视角简要评析是志的体例。

结构指地方志篇目的编排方式。到明朝时,经过长时间探索和实践,地方志的结构趋于稳定,主要有细目并列和分纲列目两种^{[9]235}。前一种平行排列篇目,后一种在篇目之上设“纲”以统摄数量不等的篇目。两种结构各有优劣,但没有高下之分。评价一部地方志的结构,一要看它设置的篇目是否齐备,能否涵盖地方社会的山川、地理、政治、建置、经济、人物和风俗等状况;二要看它设置的篇目是否有特色,能否把本地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体现出来。是志采用分纲列目结构,以考、表、志、传、录五体为纲,每纲设数量不等的篇目,计有十考、三表、六志、九传、一录,共二十九篇目,每个篇目自成一卷;有的篇目下根据内容多寡和类别,设有不同细目,如卷八《古迹考》设有丘陇、城址、官庙、台榭、泉井和旧黄河六细目。部分篇目和细目能够体现齐东的特殊县情,如十考中的篇目《河渠考》和《古迹考》中的细目“旧黄河”,透露出齐东河渠众多和黄河曾流经此地的自然地理特征。这样的设置纲举目张,便于观览。前揭《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评价是志“体例整齐,厘次有序”,主要指这方面而言。

体裁指地方志呈现内容的形式,概括起来有志、记、传、图、表、录等。在所有的体裁中,志往往占主体。是志的体裁有考、表、志、传、录五种。其中,考用以记载某个项目的历史和现状,有图考、沿革、建置、星野、河渠、疆域、祠祀、古迹、灾祥和物产十种,在回溯时多参考其他文献,如《山东通志》、《皇舆考》等;志是专门性介绍,有风俗、赋役、艺文(两卷)、兵防和荒政六种,它与考的最大区别是以记载现状为主;表指表格,有职官、选举和明经三表;传指人物传记,有名宦、人物、忠臣、孝子、列女、隐士、义民、流寓和仙释九种类传,它与表相对容易辨识;录指杂录或附录,用以收录其他四体无法收录的内容。在这五种体裁中,考的数量最多,这不同于很多地方志以“志”为主的情况。

章法指修纂地方志的要求或原则,有时集中

体现在凡例中,有时隐藏在具体行文中,需要归纳。是志卷首载“凡例六则”规定了是志主要的做法:一是续补内容的时限,“自正德十二年(1517)起至今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百年时间;二是续补内容的篇目有官职、选举、明经、风俗和赋役,“旧志略而少文,今增润颇备”;三是增设的篇目有艺文、兵防和荒政,“旧志俱不载,今搜遗文甚缺,间有残篇不娴于词”;四是收录人物的原则,“俱凭公论采入,并为立传”^[4]。在行文中,是志也透露出一定的章法。第一,图随文走。与很多地方志把星野、县治、儒学和疆域等所有的图置于卷首相比,是志采取图随文走的做法,把不同的图系于相应的内容之后,便于观览,计卷一《图考》附县图、卷四《星野考》附星野图、卷五《河渠考》附三河图、卷六《疆域考》附疆域图。第二,卷首有论,分别以“考曰”、“表曰”、“志曰”等标识。如卷五《河渠考》开卷即有“考曰:河濬八年渠成,万世盖不徒利舟楫而桑麻藉溉焉。齐东之河,若大清,若小清,若坝水、减水,其渠不一,间可运盐通沟而不能灌地,所以雨则年丰,而旱则苗稿。且土疏难于凿井,岸峻无从问水,河渠之利,所当亟讲也。愧余驱蝗力殫,度圯精疲,未能以濬。连濠者濬,东皋之畎浍也。”^[4]至于凡例中所说“旧志正德十一年止,太略太陋,且首尾无小论,今加详润”^[4],事实上仅个别篇目后附有议论。

在结构、体裁和章法三个要素中,结构决定着地方志收录的内容,体裁是收录内容的呈现形式,章法则是呈现内容的规范。三个要素以收录的内容为中心,相互关联,组成地方志的体例,也为考察地方志提供视角。

三、县情记录及其特色

地方志的内容与体例中的结构直接相关,无论其采用细目并列还是分纲列目结构,只要篇目设置全备,内容就能体现地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历史和现状;只要篇目设置有特色,内容就能体现地方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点。因此衡量一部地方志的内容,首先要看它收录得全不全、有没有特色。

是志的二十九篇目涉及自然(沿革、星野、河渠、灾祥、物产)、政治(荒政)、经济(赋役)、军事

(兵防)、文化(物质文化如建置、古迹、祠祀,非物质文化如风俗、艺文)、人物(三表和九传)等,基本涵盖齐东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虽然有的篇目,如沿革回溯到齐东置县之前的历史,但绝大多数还是以记载现状为主,体现了地方志与地方史的区别。其中,“风俗、赋役记民俗徭役,皆关本地民生利弊。艺文两卷,收载独丰,内载刘希夔为本地撰写有关水利荒政赋役等文,尤存经济故实”^[2],为研究明代齐东状况提供原始资料。严格来说,是志收录的内容不是没有疏漏,如康熙《齐东县志》就指出,“宾介、封赠、恩荫、胄伍、技艺、阴医、僧会姓名,各关镇集日期,旧志缺焉”,此外,“旧志风俗,略而少文”;“官师,旧志纪载多淆,先后失次,如元达鲁花赤布鲁不花、不列阿俱失名,高禧仅名宦有名;县尹郑忽必烈、宋雍、郑朶列图混入达鲁花赤……”;“杂录,旧志寥寥”^{[5]158-159}。其中的“旧志”就指是志。

在较为全面记录齐东县情基础上,是志也展现齐东的突出特点,那就是县治四面环河。

四面环河使齐东县城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拥有天然屏障,但在河水涨溢时又面临冲垮危险,这难免让人心生疑虑:这种局面到底如何形成的?刘希夔在卷三《建置考》的开篇就通过“考曰”发出疑问:“有其建之,惟其置之。置之安则安,置之危则危,置审而后建斯定。齐之城,北临大清河,河水涨而城不浸者三版。夫城也而可与水争乎?势不得不徙城以避涨。夫城也而可徙乎哉?徙城避水,水愈逼城。……缅想当年筑斯城也,将置不拔乎,抑以听后之人徙之乎?洵哉建之不可不审也!”^[4]

揆诸是志内容,这种局面形成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距离是志修纂的年代不算太远。《尔雅·释水》:“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10]47}济指济水,是条古老的河流,源于河南,流经山东入海。后来,济水在山东境内断流,原来的济水支流汶水改称大清河。金朝在大清河南岸的赵岩口设齐东镇,元朝又升镇为县,可见齐东县城从创建时起就位于大清河边,卷五《河渠考》记载的第一条河流就是大清河,“大清河,在县治北一里,即济水之故道也”^[4]。

明成化元年(1465),薛猷^①(今江苏常州人、举人)任知县,他在任期间除了修筑齐东县城之外,还在县东二里开濬减水河。卷五《河渠考》载:“减水河,一名陈恺沟,成化元年开濬,西南引章丘白云,流经小清河东北,入大清河。”^[4]减水河流入大清河,事实上已经使齐东县城四面环河。10年后,时任知县李宽(今江西吉安人、举人)又开濬坝水河,使县治西南离河更近。卷五《河渠考》载:“坝水河,在延安镇西二里,成化十一年知县李宽开濬,用泄归苏镇禾稼之水,南引章丘之白云河,经邹、刘二沟,北入大清河。”^[4]30多年后,为防备源自河北的刘六、齐彦明等农民运动的波及,时任知县武霓(今安徽六安人、监生)又在县治西南三里开挖御寇河。卷五《河渠考》载:“御寇河,在县治西南三里,正德六年(1511)山东流贼发,巡按御史张濬诣河所画封界,命知县武霓开濬防御,南通减水河,北通大清河,今存其迹,俗名乾河。”^[4]御寇河存在时间不长,最晚到是志修纂时的万历四十五年已经干涸,仅有遗迹。到康熙年间,坝水河尚在,减水河已经无水^[5]174;再到民国时期,坝水河和减水河不载于“河流”而见于“古迹”,说明二者已成为历史遗存^[6]157-158。

据上所述,如果以成化元年(1465)为分界点,那此前的齐东是只是大清河边的一座县城,此后则四面临河,地理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在环城河流中,大清河水位的高低对县城影响最大。在是志修纂的前后数百年间,黄河夺淮入海,尚未影响到大清河水位。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夺大清河入海,冲刷河岸严重,直接威胁到县城安全。清光绪十八年(1892),黄河决口后湮没县城主体,时任知县王儒章(今北京昌平人、举人)呈请迁城;两年后,知县康鸿达(今贵州织金人)

奉旨迁址九扈镇,县城最终湮没于黄河之下。

四、万历乙卯大旱与明朝历史细节

明朝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以影响农业生产的水、旱、蝗三灾中的旱灾为例,先是有万历十三至十八年的大旱(1585—1590),随后有崇祯年间的大旱(约1627—1643)^[11]。在这两次大旱之间,齐东所在的黄河三角洲乃至山东还有一次严重干旱。这次干旱大致始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缓和于四十五年(1617),本文暂称之为万历乙卯大旱。

对这次旱灾,《明史》的记载非常简单。万历四十三年(1615)“闰八月庚戌,重建三殿。丁巳,山东大旱,诏留税银振之”^[12]290。黄河三角洲地方志的记载更加详细。齐东,“万历四十三年乙卯,麦熟,夏,大旱,六月,谷踊贵,盗大起”;蒲台,“四十三年初夏,大旱,至七月初七日微雨,禾枯人乱。秋八月,又膳,草食木食血食,人食人,亡十之三,至四十四年春季始聊生”;沾化,“是年大旱,民相食”;滨州,“四十三年,旱;秋八月,膳,岁大饥,人相食”;无棣,“四十三年,大饥,人相食,群聚为盗”;阳信,“四十三年,大旱,雨雹,蝗蝻满地,禾麦全无”。万历四十四年,蒲台,“四十四年春,旱;秋,蝗蔽天,死徙者无算”;阳信,“四十四年,人相食。夏秋,大疫,死者枕藉”。齐东,“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夏,大旱,六月二十一日,蝗大至,蔽天,数日禾尽扫。七月,蝻复生。十八日始雨”;阳信,“四十五年,旱、蝗为灾,饥民益众”。^②

其中齐东、蒲台和沾化三部县志的版本有的增补或重刻于崇祯年间,但涉及万历乙卯大旱的条目发生于修纂者所处的时代,使得记载的可信度非常高。综合齐东和周边州县记载可见此次

^① 是志与康熙志均作“薛猷”,而民国志作“崔猷”,疑误。分别见[明]刘希夔修纂:万历《齐东县志》卷十一《官职表》;[清]余为霖修纂:康熙《齐东县志》卷四《官师》,《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0册,第224页;梁中权修,于清泮纂:民国《齐东县志》卷三《政治志·职官表》,《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61号,第272页。

^② 资料来源:[明]刘希夔修纂:万历《齐东县志》卷九《灾祥考》,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刻本胶片(索书号:CBM0776);[明]李时芳修,王尔彦纂:万历《蒲台志》卷七《灾异》,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年间(1573—1620)重刻本胶片(索书号:CBM1031);[明]丁懋逊修纂:万历《新修沾化县志》卷七《丛谈志·灾祥》,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年间(1628—1644)刻本胶片(索书号:CBM0757);[清]李熙龄纂修:咸丰《滨州志》卷五《纪事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5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版,第143页;侯荫昌修,张方壻等纂:民国《无棣县志》卷十六《祥异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625、639页;朱兰修,劳乃宣等纂:民国《阳信县志》卷二《祥异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1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版,第75页。

旱灾的特点是旱灾与蝗灾并发且多地出现人吃人的悲剧。董立峰等根据旱灾的持续时间、强度、波及地域和受灾后果,把黄河三角洲的旱灾划分为4级,万历乙卯大旱属于最严重的Ⅳ级——特大旱灾^[13]。而在分类指标中,笔者以为可以增加“人(民)相食”或“人食人”,如此更能突出特大旱灾的严重程度。

万历乙卯大旱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的记忆,是志卷九《灾祥考》载刘希夔“六月莅齐,蝗灾异常,嘉谷几无剩种。问之父老,咸曰乙卯人相食,祸倍烈于今东皋之灾,前古无是也”^[4]。人相食不仅是地方志中的程式化记录,更有许多鲜活的事例,同时期的沾化县志中就记载大旱中父子相食的悲剧,“黄升店民某有子数岁,常谓其妻曰:‘一块好肉,可惜落人口也。’其□□哭劝止。一日,诒其妻出□树□,闭户持刀欲杀其子,子号泣曰:‘爷何忍食我?’某曰:‘我不食若,人将食若,我不忍若为他人食也’。遂屠而煮之,未熟,其妻携半篮树皮至,问釜中何肉,某曰:‘邻家□至,我扑杀之耳’。妻固知其子也,寻至舍后,微露其头足,即投其夫曰:‘食尔子,宁足活,当并食尔妻’。仆地号恸,遂绝。某持其子一肘,竟不成啖,亦死”^[14]。

《明史》在这次大旱的次年接着记载,万历四十四年秋七月“山东盗贼大起”^{[12]291}。对于这次“盗贼”的详情,是志的记载更为详细。卷九《灾祥考》载:“万历四十三年乙卯,麦熟,夏,大旱,六月,谷踊贵,盗大起。……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六月初九日,河北大盗刘士鲁等十七人据济阳捕,代捕仓官王纳言跃马驰之,盗大呼急击,王纳言刺死水中,报上,军门遣指挥使领兵五百剿捕,时盗已散去。”^[4]这段引文暗示着此次“盗贼”极可能与万历乙卯大旱有关,不仅杀死官兵,还引发

高层震动。

通过这两则记载可见,地方志不是国史的缩小版,而是“可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又可为编著史书提供资料”^{[9]4}。

地方志记载着地方的山川地理、疆域沿革、建置兴废、职官往来、名宦乡贤和风俗变迁等事项,承载着地方记忆;地方志年久失修,乡绅和地方长官就会呼吁和主持修纂。是志就是在乡绅的请求下,由时任知县与地方士人共同修纂而成。地方志完成后能否传之久远,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是否为名志。在中国数千种地方志中,能够称得上名志的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地方志而言,他们的受众有限,“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7]261},主要是参与修纂人员、地方知识分子和后世的修纂者,其传承往往取决于偶然因素。官方保存的雕版会因时间流逝而自然地朽坏,也会因不可抗拒的外力如火灾等损毁,刻本同样如此,这就使得它们能否传承下去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我们看到,某部地方志会在某个时间被声称“失传”后又重现于世,继续传承下去。是志就是众多籍籍无名地方志中“失传”后又“重新”行世的一部。

中国地方志的渊源无论上溯到春秋战国还是秦汉时期,到明朝时都经历长期修纂实践,在体例等方面都形成程式化的做法,因而在修纂时,采用哪种结构,运用哪些体裁,遵循何种章法,可谓考察地方志的三个视角。是志修纂时,选择分纲列目结构,运用考、表、志、传、录五种体裁,遵循设定的章法,较为忠实地记录从正德十二年(1517)到万历四十五(1617)年间齐东社会发生的变迁和时代状况,且凸显齐东县情特色,为研究齐东历史提供原始资料,而其关于万历乙卯大旱等历史细节的记载更可补正史之略。

参考文献:

- [1]陈光贻. 稀见地方志提要:上[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 [2]金恩辉,胡述兆.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M]. 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 [3]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附索引)[M]. 瞿凤起,潘景郑,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刘希夔. 齐东县志[M]. 胶片. 北京:国家图书馆(索书号:CBM0776),1617(明万历四十五年).
- [5]余为霖. 齐东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30. 影印本.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6]梁中权,于清洋. 齐东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361. 影印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
- [7]章学诚. 文史通义[M]. 吕思勉,评. 李永圻,张耕华,导读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8]孙文件. 浅述方志的体例及篇目问题[J]. 新疆地方志,2006(3):24-27.

- [9] 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增订本[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10] 郭璞. 尔雅:卷七:释水[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 [11] 温震军,赵景波. 崇祯大旱与北方地区的食物等资源的争夺[J]. 学术界,2017(8):209-219.
- [12]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董立峰,李德一,赵昕,等. 明代黄河三角洲地区旱灾时空变化特征[J]. 滨州学院学报,2023(5):85-91.
- [14] 丁懋逊. 沾化县志:卷七:丛谈志[M]. 刻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1628-1644(明崇祯年间).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details under stylized writing: comment and analysis of *Qidong County Annals* in Wanli period

LI Sheny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Delta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256603,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Qidong County Annals* began in Zhengd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by the 45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it had been over a hundred years without any compilation. After Liu Xikui became the magistrate of Qidong County, he edited and engraved the *Qidong County Annals* in Wanli period at the request of the county people, which adopte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ith examination, table, chronicle, biography and record as the five main categories to compile 29 articles. It continued to supplement the contents from the 12th year of Zhengde period to the 45th year of Wanli period, faithfully recording the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at that time, 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dong County surrounded by rivers on all side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its subsequent relocation and even disappearance in the Yellow River. Its records on the Yimao drought in Wanli period and other issues not only reflected the social conditions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but also had their own value in correcting the historical omission.

Keywords: *Qidong County Annals* in Wanli period; style; county situation; severe drought;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李沈阳. 程式化书写下的县情特色与历史细节:万历《齐东县志》评析[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1):110-115.

LI S Y.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details under stylized writing:comment and analysis of *Qidong County Annals* in Wanli period[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6,43(1):110-115.